



青釉执壶



青釉双系瓶



褐彩人面埴



青釉夹耳罐



酱釉玉璧底座

始于中唐 盛于中晚唐 改写了中国制瓷史

南窑遗址：尽显瓷都辉煌

陈艳伟

去年3月至11月,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乐平市文物部门对位于江西景德镇乐平市接渡镇南窑村的南窑遗址进行考古发掘。结果发现龙窑遗址2座及其他窑业遗迹,总计1013.5平方米,出土多达数十吨的窑具和瓷片标本,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尤其是在南窑村窑山东南部发掘出一条78.8米长的龙窑遗迹,也是景德镇境内目前已知最早的窑业遗迹,这成为该遗址入选“201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重要原因之一。

最长龙窑遗址中别有洞天

南窑遗址于1964年由江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首次发现,1983年和2008年,乐平市博物馆进行过两次普查,1983年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011年10月,为了进一步加强对该遗址的保护和利用,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南窑遗址再次进行了重点调查。

2013年,经报请国家文物局批准同意,3月至11月,考古人员对遗址进行了

考古发掘。共发掘出2座龙窑遗迹、10个灰坑、1条灰沟和1条道路遗迹。其中一条龙窑遗迹被认为是迄今发现的最长的唐代龙窑遗迹。“这条龙窑遗址位于南窑村窑山东南部,斜坡式,长达78.8米,由窑前工作面、火门、火膛、窑床、窑墙、窑尾等几部分组成。窑头方向为北偏东30°,距地表30厘米至85厘米。”考古发掘领队、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室主任张文江说,“根据地层叠压关系以及出土窑具,推断该龙窑是使用竹藤类材料起券、用泥糊砌、用支垫烧青瓷的中晚唐时期龙窑。”令人惊叹的是,窑室内多处部位还保留着排列整齐的装烧坯件的支座,这对于了解当时龙窑的装窑量提供了重要的资料,也为研究南窑的生产流程、窑炉构造技术、烧造工艺和当时的社会经济史提供了依据。

但考古发现带给人的惊喜并不止于此。“我们在揭露最长唐代龙窑的下面时,还发现了另外一个龙窑遗址。这条龙窑的窑床中段使用了方形减火坑

的技术手法,这是以往龙窑遗址中所未见的。”张文江兴奋地说,而且据他推测,叠压在下方的龙窑,时代比上面的还要早。

其实,除了这两条龙窑遗址外,考古人员还在地表可见的明显隆起的脊状堆积中勘探出另外的12个龙窑遗迹,这些遗迹由中心最高点向东、北、西呈扇形分布。

唐代窑烧造出什么样的瓷器

南窑烧造出的瓷器釉色种类较多,有青釉瓷、酱黑釉瓷、青釉褐斑瓷、青釉褐色彩瓷以及素胎瓷,但以青釉瓷为主。器物造型端庄、器形丰富,以碗、盘、双系瓶居多。碗盘类器流行圆饼足、玉璧底,见少量的圈足碗。还发现了人面埴、茶碾、瓷铤、砚滴等罕见的器物。值得关注的是青釉、酱黑釉腰鼓和器形硕大的大碗,“这些产品或是为满足胡人所需,专门烧造或订烧的,印证了唐代赣鄱与西域地区文化交流频繁的史实。”张文江说。

尤为重要的是出土了夹耳罐、穿带壶等具有重要断代的器形。夹耳罐是公元800年前后的新产品,是随着海上陶瓷之路的兴起而出现的,是海上陶瓷之路兴起的标志性产品。“南窑出土的夹耳罐与1998年在印尼唐代‘黑石’号沉船出水的夹耳罐相似。”张文江说。

而且,南窑的瓷器具有长沙窑风格,兼具洪州窑、越窑和河南鲁山窑的特点,被考古专家称为“长沙窑的翻版”。“可以看出,南窑处在古代中国南北交通大动脉的中枢,受到了长沙窑、越窑、鲁山窑陶瓷文化的辐射,在洪州窑青瓷文化的引领下,抓住了洪州窑青瓷类型窑场衰落等有利时机,使得南窑窑火熊熊燃烧。”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郭伟民说。

将景德镇制瓷史向前推进了100年

通过丹麦Riso-TL/OSL-DA-20热释光测定,南窑瓷片的年代在公元830年至900年之间。进一步表明,南窑烧造历史悠久,始烧于中唐,兴盛于中晚唐,衰落

于晚唐,距今有1200多年的烧造历史。南窑遗址的发现将这一历史信息进行了有效的填充,具有重大的考古价值。首先,其保存有完整的支座、匣钵、匣钵盖、间隔具、火照、利头、印模等,对研究唐代青瓷窑场的窑位区分和器物装烧工艺提供了科学依据,为南方地区烧瓷窑炉发展史的研究提供了新资料。

其次,根据以往考古资料,可以证明景德镇制瓷业最早的遗存是10世纪晚唐五代时期生产青瓷和白瓷的窑业遗存。此次南窑遗址的发掘不仅填补了乐平市唐代窑业遗存的空白,更重要的是把瓷都景德镇的窑业烧造历史向前推进了一步,具有正史补史的作用。

第三,南窑遗址窑址文化堆积厚达1米至3米,深超5米,规模宏大,分布面积超过3万平方米,保存规模之巨大,完好在江西省境内同类窑址中罕见。南窑遗址的遗存丰富,包含了取土的白土塘、运输原料的江湖塘、溪坑、码头、陈腐池以及烧造产品的窑炉等反映制瓷工艺流程的作坊遗迹,“这些遗迹可以从整体规模还是制瓷工艺流程等方面再现和复原原南窑唐代制瓷的真实面貌,这在以往景德镇古代窑业遗址考古发掘资料中是不多见的,在南方地区也是罕见的,为揭示古代手工业生产、社会组织、观念形态以及其所处的生态环境等方面的状况提供新资料。”张文江说。

最后,南窑遗址还丰富了景德镇地区陶瓷内涵,为探讨景德镇早期的陶瓷历史、探索景德镇的窑业源头提供了重要线索,为研究唐代制瓷手工业和青釉瓷器发展史提供了重要资料。

古人的消暑器物

李 莹

除了渗透礼仪与科技的避暑招数,古人在日常生活中也在不断追求和创新着清凉的环境,比如家具、随身小物等,处处充满了清凉的智慧。

扇子为首当其冲的最简单趁手的消暑用品。因为挥动可以加快空气流动,使汗液蒸发、体表降温,又被称为“凉友”。扇子通常以鸟羽、竹制成。唐以前,扇子多以鸟羽为材,据说魏晋时期,身处炎热地区的吴楚之士常手执一把羽扇,诸葛亮就是典型代表。汉代竹编的扇子,常见圆形或方形。晋代,太子初立及纳妃时,还要供多种不同型号的竹扇。扇子流行得非常快,唐朝时已比较普遍。据说那时还有用皮制成的扇子,飒然成风,格外凉爽。除了扇风乘凉,扇子还演化出了不同的功用,比如用作仪仗的长柄大扇、美人用来遮面的团扇……它们或威武或娇媚,着实风情万种。

龙皮帘是用来隔在亭柱之间,以阻挡亭外滚滚热浪的一种帘子。唐大中年间,宣宗召翰林学士韦述、孙宏通进行了有效的填充,具有重大的考古价值。首先,其保存有完整的支座、匣钵、匣钵盖、间隔具、火照、利头、印模等,对研究唐代青瓷窑场的窑位区分和器物装烧工艺提供了科学依据,为南方地区烧瓷窑炉发展史的研究提供了新资料。

其次,根据以往考古资料,可以证明景德镇制瓷业最早的遗存是10世纪晚唐五代时期生产青瓷和白瓷的窑业遗存。此次南窑遗址的发掘不仅填补了乐平市唐代窑业遗存的空白,更重要的是把瓷都景德镇的窑业烧造历史向前推进了一步,具有正史补史的作用。

第三,南窑遗址窑址文化堆积厚达1米至3米,深超5米,规模宏大,分布面积超过3万平方米,保存规模之巨大,完好在江西省境内同类窑址中罕见。南窑遗址的遗存丰富,包含了取土的白土塘、运输原料的江湖塘、溪坑、码头、陈腐池以及烧造产品的窑炉等反映制瓷工艺流程的作坊遗迹,“这些遗迹可以从整体规模还是制瓷工艺流程等方面再现和复原原南窑唐代制瓷的真实面貌,这在以往景德镇古代窑业遗址考古发掘资料中是不多见的,在南方地区也是罕见的,为揭示古代手工业生产、社会组织、观念形态以及其所处的生态环境等方面的状况提供新资料。”张文江说。

最后,南窑遗址还丰富了景德镇地区陶瓷内涵,为探讨景德镇早期的陶瓷历史、探索景德镇的窑业源头提供了重要线索,为研究唐代制瓷手工业和青釉瓷器发展史提供了重要资料。

人。还有一种丝绸编织的凉席,在南朝梁人刘孝仪的形容中,使用时会觉得夏室已寒,想穿上冬天的裘袄,即便室外炎热如沸,也用不着扇子。语虽夸张,却可见其神奇的避暑效果。

玉、石之类为天然凉物,夏天可以作为倚身之物,祛除暑热。汉朝时,“凭玉几、倚玉凭”乃是帝王级的清暑享受。据说,汉武帝宠幸董偃,在未央宫清凉殿中,以画石为床,罩紫琉璃帐,以紫玉为盘,为董偃度夏。汉成帝时,赵飞燕、赵合德姐妹受宠。赵合德所居的昭阳殿中,便备有玉几玉床,白象牙扇等,还赠给赵飞燕琥珀枕、云母屏扇、琉璃屏风等,都是清凉之器。到了唐朝,人们还曾以石棋盘贴腹祛热。可见玉石解暑的习俗流传不绝。

瓷枕也是一种极为特别的消暑物品。瓷枕的枕面是一层釉,夏天枕于其上,睡起来格外凉快。据说清乾隆皇帝就很喜欢睡瓷枕,他曾题诗云:“瓷枕通灵气,全胜玳与珊。眠云浑不觉,梦蝶更应安。”

竹夫人是用青竹编为长笏,或取整段竹中间中空,四周开洞然后通风的东西。南方消暑炎热,人或抱枕之,可以依竹子的清凉、透气取得体感的凉爽,也有人称其为中国古代最有情味的消暑用具。竹夫人大约唐代已有,又被称为“竹姬”“青奴”等,大概与今天流行的抱枕属于同类用品。

陕西出土服务唐陵的砖瓦窑

本报讯 (驻陕西记者赵建兰) 6月14日,“文化遗产日”当天,在迄今发现的唐代砖瓦窑规模最大、数量最多、保存最好的窑群——陕西富平桑园窑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携手富平县文物旅游局共同举办“传承文化遗产、添彩美丽富平”公众考古系列活动。

在陕西省富平县境内,共分布着5座唐代帝陵,也是陕西省分布唐陵最多的县,其中唐中宗李显的定陵,则因规模宏大,堪称盛唐帝陵的代表。2012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对“唐陵大遗址保护”考古项目的定陵陵园勘探中,在定陵西南侧900平方米范围内,发现分布有13组共495座唐代砖瓦窑,每组窑群多者40座至50座,少者数座。

2013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富平县文物旅游局对该遗址开展了考古发掘工作,选择了13组窑中的一组集中进行发掘,揭露遗迹种类有南北向操作通道、窑、东西向支通道、灰坑等。出土遗物主要是砖、瓦烧成品与生坯,另有少量陶制工具、陶片、瓷片与铜镞等。发掘的窑炉皆为马蹄形半倒烟式馒头窑。颇为有趣的是,在部分窑炉的窑床上还留有装窑形成的印痕,印痕显示长方形砖在窑床上南北向成排摆放,排距约5厘米。在个别窑炉窑壁上刻有文字,可识别的有“王”“毫”“九”“论”等,还有小篆等纹样。“这或许是工匠们建窑时即兴涂鸦之作,却给考古人员留下了珍贵的资料。”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桑园窑址考古队队长于春雷说。

消息长廊

第六届全国青少年文化遗产知识大赛举办

本报讯 (记者刘修兵)6月11日至13日,来自全国30所大中学校的90名大学生齐聚江西景德镇,参加由国家文物局指导,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中国文物学会、中国博物馆协会及景德镇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六届全国青少年文化遗产知识大赛。

本届大赛分为中学参赛组及大学参赛组,其中中学组包括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西安交通大学附属中学、江西省临川一中等14所重点中学,大学组包括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

中山大学等16所国内文博专业实力较强的高校。

比赛内容围绕中国历史、中国文化遗产、世界文化遗产等基础知识,设置了笔试、古建拼装、瓷器修复、展陈设计等环节。赛程紧张有序、互动性强,通过前期的文化遗产微电影比赛和丰富多彩的比赛,有6所大学和6所中学进入了6月13日的决赛。最终渤海大学、西安交通大学附属中学分别获得大学组和中学组第一名。另外,大赛还颁发了个人风采奖、国学使者、国艺使者等个人奖项。

专家研讨我国北方旱作农业起源地

本报讯 (记者杜洁芳)在内蒙古敖汉旗日前举办的“我国北方旱作农业起源座谈会”上,有学者提出,根据从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古代遗址出土的黍和粟碳化颗粒标本研究证明,敖汉地区是世界四大粮食作物中黍和粟的发祥地,也是我国古代旱作农业起源地。

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赵志军说,中国、加拿大和英国的专家经鉴定后认为,这些碳化黍子和谷子标本属人工栽培形态,距今7700年至8000年,比欧洲地区发现的种植谷子早2700年。

距今约8000年的兴隆沟遗址位于

敖汉旗宝国吐乡大窝铺村西南500米的缓坡地带。2001年至2003年,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与敖汉旗博物馆等研究人员对此处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在总面积4.8万平方米的遗址中,发掘房址约37座,居室墓葬26座,碳化谷物标本以及陶器、石器、骨器、蚌器、玉器文物。

赵志军推断,兴隆沟遗址中出现的碳化谷物遗存,是目前世界上所知最早的,人工粟和黍的栽培遗存标本,证明这里是横跨欧亚大陆旱作农业的发源地,同时也是世界最早人工培植粮食农作物的区域之一。

北京皮影艺术展首博开幕

本报讯 (记者杜洁芳)由首都博物馆、北京市西城区文化委员会主办,北京市收藏家协会、北京首都文化投资管理公司、北京皮影剧团、首博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承办的“千年魅影——北京皮影艺术展”近日在首都博物馆开幕,近700件明清、民国时期及现代北京皮影代表作品与观众见面。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皮影举办的首次大型专题展览。

为便于展示,此次展出的皮影多以固定的人形皮影、人物、场景为主。其中,《九龙壁》是北京皮影剧团有史以来制作规模最大的一件作品。该作品宽

4.2米,高1.1米,是依据皇家九龙壁色彩和造型仿制而成,堪称展示皮影雕刻实力的经典作品。此外,《水浒一百单八将》系列也是一大亮点,雕刻风格潇洒飘逸、造型典雅质朴、色彩古朴不失亮丽,让观众流连忘返。

北京皮影剧团团长路宝刚介绍,此次展览中不仅有北京皮影剧团制作的精良作品,还有一些是北京皮影剧团的老艺人们收藏的明清时期的作品。其中一条明代流传至今的马皮制作《北京龙》造型栩栩如生、色彩鲜艳,实属珍品。

考古探秘

唐蕃古道：民族文化融合之路

本报驻陕西记者 赵建兰

但不论是学界还是普通大众,对这条由唐都长安通向“世界屋脊”的唐蕃古道了解得并不多。此次考古探险活动,就是希望有新的发现,从而加深人们对于唐蕃古道的认识。

“一般认为,唐蕃古道分为东段和西段两部分。东段的大体走向是:长安(陕西西安)—凤翔(陕西宝鸡)—陇州(陇县)—秦州(甘肃天水)—河州(甘肃临夏)—鄯州(青海西宁)。西段就是从鄯州到吐蕃牙帐(拉萨),这是唐蕃古道的主体部分,它分为南北两条支线,北线是文献记载的驿道,由玉树经夏拉,南线即从玉树经四川石渠县、德格县,进入西藏江达县,经察雅、芒康、林芝、工布江达进入拉萨,是近些年通过考古发现逐步确认的唐蕃古道的新支线。”张建林说,文成公主从西安出发,究竟走了多长时间,是由北线还是南线进入西藏,由于缺乏确切的史料记载,仍有待于进一步的考古论证。

唐蕃古道,有待新发现

在此次“重走”唐蕃古道之前,上世纪80年代初,青海省博物馆、青海省文物考古所等单位就曾组织过类似的考古活动,但之后类似的考察与研究就很少了。今年,随着“丝路申遗”工作的逐步实施,中国西部文化线路遗产的考察与研究项目相继启动,为进一步保护和传承唐蕃古道这一历史文化遗产,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甘青川藏四省考古研究机构,启动了新一轮的“2014年唐蕃古道考古探险”活动。

“唐蕃古道”考古团团长、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张建林说,从史前时期开始,西藏就不是一个完全封闭的空间,它和中原地区、其他的民族和国家,有着非常频繁的交流 and 互动。唐蕃古道作为连接中原和西藏的交通要道,向南延伸至尼泊尔、印度,成为“丝绸之路”南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尽管“丝绸之路”的故事家喻户晓,

公元640年,奉唐太宗之命和亲吐蕃,公元680年在吐蕃去世。”张建林说,这段野史记载是否真实,现已无从考证。而文成公主的丈夫,松赞干布虽然是吐蕃历史上最有名的赞普之一,历史上也没有关于他具体生年的记载,因此,我们至今也不知道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在年龄上是否般配。传说,文成公主入藏9年,年仅25岁,松赞干布就去世了。

如果以上说法属实,根据历史记载,唐朝有再嫁风俗,尤其是和亲的公主,可以在丈夫死后申请回长安再嫁,而且吐蕃也有皇帝死后其妃嫔都归他儿子的习俗,文成公主都没有依照这些习俗再嫁,而是一个人吐蕃生活了40年,为汉藏两族人民的友好联系和藏族经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直到现在,在西藏的大昭寺和布达拉宫还供奉着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的塑像。

唐蕃古道：民族文化融合之路

自文成公主入藏、唐蕃古道开辟后,作为特殊群体,去天竺(印度)取经拜佛的僧人在这条路上明显增多。据《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对走这条道路的僧人做了一个粗略统计(可能其中有很多人并未全程走这条路,只是取道去印度),结果显示,当时走唐蕃古道的僧人虽不是很多,但与文成公主进藏之前相比,还是有明显增加。这说明,唐人已经意识到去天竺国事实上还有一条捷径,在这条捷径的两端是两大文明古国。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唐蕃古道在迎来短暂的黄金期后,其余时间基本上处于关闭状态,“即便是这样,也应该看到,唐蕃双方使臣的相互往来是这条道路上的主体人群,文成公主在唐蕃古道上不仅带去了书籍,也带去了唐王朝的物产及其他东西,这条道路本身就是一条民族融合之路。”张建林说。



唐蕃古道

之路。”张建林说。

汉藏两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体现在方方面面,瓷器则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项。根据历史记载,我国成熟的瓷器烧制技术完善于以汉族为主的中原地区,它是汉族和其他民族进行贸易往来、礼品馈赠的主要物品,它在承载着各民族友谊的同时,也记录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瓷器从中原流入西藏早有记载,但早期的流入方式多以赏赐为主,并未形成大规模的贸易往来。大规模的贸易往来盛行于明朝以后,所以,无论是从西藏还是从陕西西安,抑或两者之间,唐蕃古道,其传世和出土的明清瓷器都具有明显的汉藏文化痕迹。”张建林说。

文化是一个国家长期积累的精神财富。唐蕃古道承载着1300多年的历史沉淀,其文化价值不言而喻。从唐蕃古道形成的那天开始,汉藏人民便开始了不断的文化交流与融合,无论是朝代更替抑或是战火纷飞,都没有隔断两族人民的文化交流与融合。